

今天 2011年夏季号 总 93 期

目 录

“七十年代”专辑

我在林中狩猎的日子
乌热尔图

乡村记事
姜健

坎坷十年
陈红兵

无名年代
马可鲁

青春与歌舞
郑丹

依依韶華舊樂
常罡

“拍婆子”与黑格尔
牟志京

草原
秦晓

半步桥
贺延光

诗与诗评

小镇
于坚

中、日、韩、台青年诗人互动专辑
田原

【日本】

蜂饲耳 / 水无田气流 / 小笠原鸟类 / 岸田将幸 / 文月悠光
评论：田野仓康一

【韩国】

黄圣喜 / 金言 / 金经株 / 金止女 / 吴银
评论：徐东煜

【台湾】

陈育虹 / 零雨 / 孙维民 / 鸿鸿 / 鲸向海
评论：杨佳娴

【中国】

廖伟棠 / 拾柴 / 盛华厚 / 赵昕 / 苏笑嫣
评论：田原

八方来鸿

自由：喧闹世界里的诗情
——走近美国诗人简·赫什菲尔德
田草

今天画页

在空与满、有与无之间
——沈忱 VS 钱志坚

坎坷十年

陈红兵

陈红兵，祖籍山东曲阜，1943年农历11月10日出生于陕西宝鸡，两岁随家人到洛阳生活至今。1966年河南大学（原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1967年10月任河大革委会主任、开封市革委会常委，1968任河南省革委会常委。1968年底在解放军农场一年、农村插队两年、教学一年，1973年担任原阳县委副书记兼靳堂公社书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被判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0年出狱后自谋生路，现为一民营企业文化传媒办公室外聘专家。

我在《七十年代》一书作者群中算是个另类。没有我这个另类，七十年代就无法组成真实的完整的篇章，就只能永远是一部分人的边缘记忆，充其量不过是被拆掉的旧窗玻璃碎片的骄傲的闪光。那旧窗连同破碎的玻璃虽然又被装起来使用了，但那旧窗的旧，和玻璃的破碎，却只能永远地“旧”和“破碎”下去，无法让后人了解七十年代的全貌。

七十年代是六十年代的延续，是在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结束、中共九大胜利召开的大背景下开始的。看着九大主席台上赫然坐着的陈永贵、王进喜、孙玉国等代表人物，工人农民心里想的估计和精英们会有很大差距。李零先生说，“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这话很经典，但他只是说出了一种趋向。如果我说七十年代是两种思想的激烈搏斗，大概也很少有人反对。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同斯诺谈话中就说：“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毛泽东文集》8卷396-413页）所有人都在思考，所有人都是在围绕着这个大背景思考。不管你当时是否认识到，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也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

我是河南大学（原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六六届大学毕业生，文化革命中是学校造反派头头，1967年先后被选为开封师院革委会主任、河南省革委会常委。1967年底分配留校，1968年底再分配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七十年代开始的时候，我又被分配到河南原阳县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在农村教学一年；“批林整风”后，当县委副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三年；毛泽东逝世后，七十年代最后四年在隔离审查、被大规模批斗、被登报逮捕、被判20年重刑投入大狱。

我出身城市贫民家庭，父亲是清洁工人，洛阳市劳动模范；“文革”前我是河南大学中文系团总支委员，学习也在前列。说造反派出身不好、不好好工作，对党不满、有野心，在我身上找不到根据。文革前我由于长期担任学生干部，才对当时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了解较深，感到好多不正常，所以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出于那一点点肤浅的觉悟，后来斗争发展到那么深刻的程度，却也是我初始没有想到的。虽然我在文化革命中遭遇的苦难比任何人都多，但从来没有对自己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感到后悔、怀疑和动摇。因为有一个基本认识支撑

着我：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解放就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文化大革命是符合这个历史潮流的；我认同毛泽东的人民之心！我的这个认识对不对，让别人评价。我只是说出我自己的真实想法。

农村插队和当“官”

1970年初，我在太康县解放军农场锻炼一年后，又被分配到新乡地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当时并没有感到什么不愉快，还主动放弃原分配方案，要求到最艰苦的、河南有名的贫困县——原阳县农村插队。插队的村子名唤下马头，早先大概是黄河岸边的一个码头，因为黄河不断滚道，逐渐南移，这里就成了村落，日久天长，“码头”也叫成了“马头”，当时归福宁集公社管辖。我住在十一生产队两间泥坯草房的落分（记工分）屋里，生产队会计把一半的空间打扫干净，摆一张床，摆一张旧桌，就算是安下了家，每天和社员一起出工收工，在庄稼地里忙活，在群众家里吃饭、拉家常，给五保户困难户担水，学犁地等农活，对农民生活加深了了解。

下马头大队属中等偏上的大队。大队有一台履带式拖拉机，一台天津铁牛55轮胎式拖拉机，一个小砖窑。各生产队有自己的菜园，农民生活虽不富裕，但没有一个人生活过不去，军烈属、五保户都得到照顾。农村基层造反派很少，当时中央表态支持“二七公社”、“八二四造反派”之后，原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一句话“贫下中农都是造反派”，稳定了农村局势（但可惜这位优秀的地委书记八十年代被打成反革命抱恨去世）。但农民心有不平敢于说话、敢于向干部提意见，大队干部谨谨慎慎，关乎大家利益的事情常开会向群众说清楚。这些还是同文化革命前有了很大不同。农村干部学大寨积极性很高，平整土地、打机井抓得很紧。农村买拖拉机和城市比便宜很多，打机井国家出资为主，农民出力为主，群众对党的农村政策很满意。打机井时，我和年轻农民四人抬一个六百多斤的水泥机井筒，一手拄杖或者抓住旁边人的肩膀，喊着号子，把机井筒送到井边。夏天麦收打场是农民最高兴的日子，我也向农民学会单胳膊把五斗麦子布袋放上肩膀的本领。一般农民勤劳朴实，很善良，对待下放锻炼的干部学生，对待在政治运动中被批判过而下放到农村的人，从不歧视。不管上面说这个人如何坏，他们从来都有自己心里的评判标准。这一点给我的感触很深，使我从内心里认他们为朋友。

后来我女朋友毕业了，她放弃直接分配工作的机会，要求和我一起插队。我们到福宁集公社登记结婚，生产队把落分屋用砖墙隔开，经我爱人一整理，半间草屋的新房竟然光彩四射，令人惊讶。我平生第一次感到女人的伟大、爱情的温馨！我们一起住进新房的那天晚上，各生产队插队的大学生和乡亲们挤满一院子，笑着嚷着。我们两个向大家三鞠躬，唱一首革命歌曲，撒了喜糖，就算举行了婚礼。村里的大婶大嫂过来教我爱人学做饭，我们婚后一起参加劳动，日子很香甜，没有八十年代精英那种天下苦痛集于一身的、仿佛耶稣受难的感觉，也从来不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那样的话。不到劳动者中间，怎样了解他们的需要？不了解他们的需要，怎样为他们服务？共产党不为大多数人服务，难道还叫共产党吗？

我爱人怀孕后反应很厉害，经常呕吐，串村卖豆腐的来到门口，她要多买一些，我只让买了二斤。不是没钱，也不是不心疼她，只是不想让自己的生活与农民有太大的差距。谁知当天晚上被猫拱开了案板上扣盖豆腐的瓷盆，豆腐糟蹋得一塌糊涂，也没有吃成。妻子眼泪流得哗哗的。后来遇到同学们，她常常用这件

事诉我的苦。他的女伴也笑着指责我：“极左！极左！快赔礼道歉！”但是1976年以后我被抓进监狱，她因我吃了许多苦而无怨无悔，又对朋友说：“我实在想不出他的坏处。”一直等我十多年，一手把两个孩子养大。

1970年“一打三反”和抓“五一六”运动，不知怎么，又变成了整造反派的运动。学校里军代表掌握了领导权，我的几个战友成了“五一六”嫌疑，看管他们的是过去对立群众组织的骨干；省委军代表王新把第一书记刘建勋的秘书王书庆也打成“五一六”，关进了学习班。我有一次回郑州，看到街上贴的法院布告，开封地区我熟悉的三个人名被打大红勾枪毙了。其中马九春，虽不是令人喜欢的人物，但绝没有该杀的理由，肯定是冤案。这种恐怖气氛当时确实让我一阵心寒。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用来镇压人民！这是毛泽东1956年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强调的社会主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可惜，很多领导人没有记取。

把学习班变成限制人身自由、搞“逼供信”的专政手段，是从林彪开始的，一直流毒至今，造成大量冤案，很值得人们思考。后来知道，我的同学被办学习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揭发我这个造反派头头。如果不是林彪事件暴露，在解放军农场已经被“清理阶级队伍”审查过的我，恐怕也难逃又一次厄运。

关于林彪事件，我是在县里听到中央文件传达的，之后“五一六”学习班便渐渐撤销。物理系的一个头头在街上与我偶遇，对我没进学习班表示大惑不解。他紧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路边，反复地问：“你真的没进学习班？你真的没进学习班？你这个大鱼真的没进学习班！”看得出，他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处于被压制状态中，以致毛泽东亲自出面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

1972年初，我和插队的学生们一起被分配工作，教育局局长和我谈了两句话：“红兵，就是这样了，也别有其他想法了，去农村教学吧！”我被分配到原阳县最边缘的祝楼公社高中教学。临行那天，祝楼派一辆马车前来县城接我们一家。大雪初晴，温暖的阳光笼在厚厚的雪原上，让人体味到真正的美丽有时是非常简单的。清脆的鞭响，嘚嘚的马蹄声，喜鹊蹬落的雪粉和欢快的叫声，打破原野的宁静。我和妻子以及执意要送我的长春地质学院学生李旭，摇晃着坐在装着铺盖行李的车上，未满周岁的儿子倚在妻子的怀里，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一只不知名的白色大鸟，忽然在路边沟渠未结冰的水面上掠了一下便腾空而去，是不是叼到小鱼我没有看到，水面上散开的涟漪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赶车的老乡五十多岁，从旧社会过来，对生活很满足，一路上给我们讲一些风土人情、笑话掌故，大家爽朗地笑着，蜿蜒五十里的乡路也不觉得遥远。

祝楼高中是个文革中新建的学校，班级不多，没有设美术课，我爱人改教地理，我则干老本行，教语文。我教《曹刿论战》等古典课文，不看教案和课本，边背诵边讲，甚至还讲与课文注释不同的见解，蒙得学生睁大眼睛听；我重视改作文、帮学生办壁报，循着学生思路和思想，把他们不成文章的作文改成完整文章，思路不清的理顺，让学生从实践中体会写作方法，对学生帮助也很大；我和学生一起参加建校劳动，一起打扫厕所，不摆老师架子，直到现在学生都愿和我保持联系。校长是个没有学历的农村基层干部，踏实为教师服务，任劳任怨，对造反派没有好感。他后来对我说：“听说分来个造反派头头，我心里不安了好多天。来了一接触，不是想象的那回事，人还不错，教学也有本事。你这个造反派我赞成！”

1973年3月，我在农村入了党，选拔到中共原阳县委担任县委副书记，兼靳堂公社书记。靳堂公社不大，仅两万人，十多个生产队，社小队小，土地肥瘠

不同，有黄河滩地，有背河涝洼盐碱地，有沙地，也有较好的两合土地。因在盐碱地推广种稻，吃饭住房问题不是很大，但公社、大队、小队普遍缺钱，科学种田投资跟不上，制约了发展，集体经济不富裕。用有的生产队长的话来说：“买根鞭稍的钱也发愁！”我一方面和农民一起学大寨，兴修水利，平整土地，一方面号召大家发展社队工业和集体副业，自力更生办起个公社机制砖瓦厂。砖窑是动员干部群众打土坯建起来的，50米高的烟囱是请来获嘉县的一个行家带领农民自己建起来的。获嘉这个行家出身不好，但又懂建筑又懂翻砂，别人不敢用他，我把他请了来。只有钢筋和砖机是花钱买的，20多门的机制砖瓦窑厂总共花两万元就开始生产。工人宿舍都是利用烂砖自己动手陆续盖起来，不经意间培养出一批建筑工匠，在公社氨水厂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氨水厂高高的烟囱上书写着红色的大字：“走自力更生道路，建社会主义大业！”很振奋人心。我又帮助夹滩大队办起了大型面粉厂，看到好处，其它大队也在酝酿。为了节约资金，氨水厂建设用的石头，是我和干部群众一起从百里之外的新乡潞王坟山上拉回来的。“县委书记拉石头”，在当时并不罕见，但群众却记在心里，一直传说到今天；冬天搞农田基本建设，寒风凛冽的十一月份，县里组织引黄渠清淤会战，我也和群众一起挖泥修渠，晚上和群众一样，在黄河滩上铺一层厚厚的麦草豆秸和褥子，盖两个被子，夜里凉凉的霜纷纷落在脸上，这让我认识到，什么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夏天里和社员一起深锄地，渴了喝机井水，肚子咣咣作响……那时的新干部大多不脱离劳动；无论职位多高，和群众拿一样的工资；后来河南数千名新干部被判刑，贪污犯罪几乎没有。1976年之后我挨批判，批判的人在大会上说：“我是只批信（指我给刘建勋写的一封表达批评意见的信），不批人。说实话陈红兵来原阳办了很多好事，没办坏事。”

伟人逝世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人民由衷地感到悲痛。我当时从外地赶回，在公社附近的路上，一位农民正走着，忽然蹲在路边抱头痛哭，我赶快停住自行车把他搀起来，他指着哀乐传来的方向说：“不说别的，毛主席这些年把国家治理得多平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对毛主席怀着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轻易撼不动。工人农民士兵和劳动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被选拔到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任何一个普通群众可以写大字报，或者公开批评他的上级，没有哪一个农民或者工人有了重病，因为没钱得不到医治。这是有史以来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翻天覆地的新鲜事，但毛主席领导的国家做到了，人民怎能不热爱他！

毛泽东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主体思想，和群众结合，就是中华民族历史进步的伟大动力，毛泽东指出我国“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清醒而意义深远；他实施的用人民权力监督、限制和逐步消灭官僚特权、资本特权，最后消灭一切特权的方案，已在实践中起到遏制腐败的明显效果，要比现代社会用一部分官僚监督另一部分官僚腐败，用所谓“两只手”来遏制资本垄断和社会不公，都先进而有用得多。毛泽东在文化上站在历史的前列，本应该中国的知识界认真研究。邓小平说永远不去掉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胡锦涛说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我想是会得到历史的肯定的。

我被推进地狱

1976年11月，在停职检查一段时间后，我被押回开封隔离审查。那天开封来了四五个人，开一辆面包车，从柳园渡口坐船过河到开封。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大木船过黄河，黄河水混不易辨别深浅，船头一位瘦筋筋但结实果断的老艄公，眼睛盯着水面，抖动着胡子的嘴里发出坚定的声音：“进一！”“进三！”……船尾的摇橹人倒是神色沉稳，两边船帮上，几个年轻人手执长篙，高声吆喝着，前后走动，不断同时把长篙插进水里，用力给船行输入动力。这场景，简直就是一个国家进步的譬喻：方向、动力、团结！我记得当时曾哼了几首古诗，记录下心中的感慨，后来偷偷写成文字，只是辗转中遗失了。然而祖国这只大船今后如何前行，那时我已经不知道了，我已经失去了自由，并没有说话的地方！船抵开封上岸，押送我的人掏出手枪朝天放了两枪，大概是庆祝他们的胜利，我也很快从这一情节中读出其中隐藏的险恶：还没有审查，他们就已把我看成了敌人！

就在那天晚上，我被送到开封高压阀门厂一个弃用的仓库的小屋里，被厂保卫科的人看管了起来。此后又转移到空分厂氮气车间、空分厂澡堂楼上、空分厂技校操场小屋。十个工人轮流值班看管我一个人，房间里换上低压灯泡，烧开水电炉也是低压的，大概是在防范我自杀；气氛搞得很紧张。其实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要自杀，因为我一点也没有精神崩溃的感觉。隔离审查中，我确实认真读当时的批判文章，希望能看到自身思想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但是很遗憾，我并没有看到一篇有说服力的、不自相矛盾的文章。

隔离初期是查我和四人帮的牵连，但查来查去，除了我写给刘建勋的批评信之外，也没有查到其它实质性问题，拉我到全市各系统参加了十八场批判大会，也没有突破性进展。1978年上半年，市委审查组很少来问，对我的看管也松了一些，每天早上我到操场跑步，看守的工人继续呼呼大睡。有一天，我忽然看到妻子在操场铁门外向我张望。我快步跑过去，铁门也并没有关，但妻子摆手不让我出去，说：“你继续跑步吧，我就是想看一看你！”

1978年7月邓小平批评郑州大学揭批查有阻力，刘建勋应声下台，全省又掀高潮，我也被转移到开封烟厂严加看管。1978年11月16日深夜，我被宣布逮捕，戴上手铐，塞进一辆北京吉普，左右两人押送，沿着郑汴大道从开封向郑州驶去。起初我并不知道后边还有一辆吉普车尾随着，中途偶尔向后边一望，才发现那雪亮的车灯、颠簸的车身和车前侧飘飘的红绸带。我在心里笑了一笑，猜着里面可能坐着我们的战友、兰考著名县委书记张钦礼。到了省看守所正给我办手续的时候，又听见有人进来问，党言川到了没有？给我办手续的看守小声回答，已经关进号（监房）里了。我这才知道，当夜河南革命造反派的三大著名头头同时被逮捕。党言川是河南“二七公社”的学生头头，我是开封“八二四”的学生头头，张钦礼是“兰考卫焦”的头头。河南支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派——“河南十大总部”、“河南造总”、“开封左司”、“兰考卫东林焦”的头头一个没抓，并且这时大多成了整我们的掌权者。

文化革命前，我对于监狱的了解是从小说里得到的，写的也都是国民党的监狱。特别是小说《红岩》里描写的监狱，白公馆、渣滓洞，水牢、地下室，给我的印象格外深刻。所以1967年“二月逆流”中，我第一次被抓进开封市看守所的时候，一看不是地下室就觉得比小说里写的要好多了，只是卫生条件太差，我生了满身虱子，戴着手铐的手一抓就是一两个；这次被抓来省看守所，感觉清洁程度比开封市看守所好了许多。虽然我知道斗争又升了一级，但愤怒在我在逮捕证上签字之后就转归于平静了——在逮捕之前，我认为是党在审查自己，审查一个党员；看到逮捕证时，我知道眼前的这些人根本不讲理了，已经不实事求是

是了，不再抱任何幻想，知道这是一次严酷的斗争，比1967年“二月逆流”那次更为严酷；既来之则安之，问题反而变得简单。心里竟然漾着一种并不十分明白的乐观情绪，心情并不沉重，甚至没有什么失落感。看守把我的裤带和鞋带抽去，给我编了一个号码——010，告诉我以后提审叫010就是叫我，然后把我送进一个监房，随着一阵咚-噉里夸啦-咔嗒的熟练的关门声，我就成了河南省看守所的一个在押人犯，代号010。

省看守所原名省直监狱，座落在郑州市纬四路十号。省直监狱可能是在国民党监狱的基础上整修而成的，保留着那时的八卦布局，犯人在筒子里分不清东西南北。解放后这里主要关押国民党战犯和全省重大案犯，1959年以后国民党战犯分批放完，这里就逐渐冷清起来，只有延安时期中共保卫局长、解放后中共开封市委第一书记戴季英还关在这里。他吃小灶，可以自由活动，并没判刑，是吴芝圃五十年代把他抓起来的。我们进来不久，他就被释放。从此，省看守所关押的人犯，共一百零五人，除少数过路号（临时羁押的外地犯人）和几个刑期很短的犯人外，九十多人都是造反派干部。当时郑州八科（郑州市看守所）和各地市县看守所，人满为患，也以我们这班运动犯为多。

我所在的监号，大约不到十平米，进门是一条横的、宽约一米的通道，通道一端放着茅桶。通道里面便是半米高的一条通铺，连我一共六个人就挤在这三米多长的通铺上，白天坐，晚上睡。享受每人一平米多的、被严格限制的“自由”。

几天之后，看守给我送来一份《河南日报》，证实了我的猜测，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头版右下以重要新闻的规格赫然登载一篇消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 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张钦礼”，全文如下：

本报消息：为了深入开展“一批双打”斗争，坚决打击“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将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清除出党，依法惩办；将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开除党籍，依法惩办。公安机关已将三犯依法逮捕。

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反党乱军，大搞打砸抢，残酷迫害老干部，疯狂镇压群众，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罪恶昭著，不加惩办不足以平民愤。

原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包庇纵容坏人，反党乱军，大搞打砸抢，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遭受严重损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

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张钦礼，大快人心，大得人心。当地党委正放手发动群众对三犯的反革命罪行深入进行批判斗争。

决定中“罪恶昭著，不加惩办不足以平民愤”和“罪恶累累，民愤极大”这些话都是过去死刑判决书里才会出现的套话，其意已经十分明显。但罪状不实就没有震慑力。比如张钦礼“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遭受严重损失”，我一看就知道是颠倒黑白。张钦礼继承焦裕禄遗志，带领群众引黄灌淤，使二十多万亩盐碱沙荒地变成良田，彻底改变兰考面貌。这怎么变成了罪过呢？后来他出狱后去世，十万兰考人民自发为他送葬，民心苍天可鉴。我们后来都没有按反革命罪判刑，也说明河南省委这个决定给我们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是错误的。后来我了解到，正是从这时开始，凡是曾经支持过造反派的干部，包括刘建勋、纪登奎，无一幸免成了被清查的对象；工厂里直到班组长，农村里直到生产队长，全省达一百万人。

在看守所里就三件事：提审、放茅（放风）、打发时光。提审包含两个内容，一是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二是揭别人的问题。我最想不通的就是让“揭”别人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的，光明磊落，不是阴谋活动，至今仍是全世界政治最公开透明的时期，一切都在明处；我们只是按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指示领会精神，揭发什么？不揭发就说你态度不好。有一天半夜里把我提出去，说是省委常委会议在等我的揭发材料，一个问题是刘建勋支持攻打开封化肥厂的武斗，另一个问题是纪登奎派专列送我和“八二四”的群众回开封武斗。攻打化肥厂的武斗就没有发生过，开封化肥厂“左司”武斗据点是空十三师师长王洪智派人打入内部做工作和平解放的，为此江青还称赞王洪智是“杨子荣式的人物”。刘建勋从来都不支持攻打化肥厂，我们也较早批判“向凡尔赛进军”、“武装保卫开封”的极左口号，制止了攻打化肥厂的思潮，这些在开封人所共知。纪登奎派专列，他当时就没有那样的权利。解释后他们让我马上写成材料。当夜又提审一次，声色俱厉地对我说：“省委常委对你的材料很不满意！”让我再回忆揭发。不满意就不满意吧，那是事实！后来我也没再写，他们也没再问。

有一天，我们监房里关进一个过路号，十七八岁，一坐到床上就唱起了《狱中之歌》：“铁门呀铁锁呀铁锁链……”唱着唱着，他忽然侧过脸问我们：“你们都是因为啥事儿进来的？偷了？抢了？X了？”我们回答都不是，他仰头一笑，连连摇头说：“不值，不值，不值！”然后继续哼他的歌。

1979年10月，黄河水利委员会黄希正等四名工人首先被判刑。他们的问题1968年已经由军管会判过刑，刑满已释放，这次以帮派体系包庇为名，同样问题再抓加判两年。他们不服，上诉到最高法，结果裁定再判无效，立即释放。最高法依法办事被河南从反面理解为“教训”。他们为了规避最高法的二审权力，同时避开1980年1月1日新《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约束，赵文甫通知全省将我们的一审权限层递下降，比如我们本应省高法一审的，下放到市中法一审；本应市中法一审的，下放到区法院一审，把终审权牢牢掌握在当地和本省，为他们违法突击判决扫清道路。

河南原省委书记吴芝圃1958年搞浮夸风共产风命令主义歪风，给河南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当时赵文甫是吴芝圃的黑高参。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理所当然地批判了他们，赵文甫一上台就大搞报复，根本就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就在1980年1月1日新《刑法》正式实施前的一个月时间里，把数千人的案件突击判完。不公开审判，不出示证据，不允许辩护，在新《刑法》正式生效前运用新《刑法》的罪名入人于罪，判决书只说依法，却不说依据什么法哪个条款。据当时省委领导人公布，全省开除党籍106000人，判刑2700人，实际比这更多，开创了建国以来的冤案之最。

看守所里后来让送书，忘了是不是《收获》杂志上登载的两篇小说，给我思想影响很大。一篇是《罗曼亲王》，一篇是记不起名字的南斯拉夫小说。《罗曼亲王》说的是一位王室贵族支持农民起义失败后受审的故事。他的妹妹买通法官，约定：只要在下次开庭审判时，罗曼亲王承认自己支持农民起义是受了坏人的蛊惑，就可以宣布无罪释放。妹妹将这一切转告给罗曼亲王。开庭这天，法官问道：你身为亲王，支持农民暴动，是不是受了坏人的蛊惑？罗曼亲王高声回答：“不，这完全出于我的自愿！”结果罗曼亲王被判流放。期满后靠妹妹接济生活，他还是经常把妹妹接济的钱散给周围的穷苦农民。南斯拉夫那篇小说写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兵在树林里捉住一名南斯拉夫战士，一腿受伤，他们让战士面向大树要枪毙他，但战士勇敢转过身来面对着德国人。几次把他转过去，他又一

条腿跳着转过来，表现出不惧死亡的英雄气概。这两篇小说极大鼓舞着我的信念和勇气。当我的《起诉书》发下来的时候，全号看过的难友都屏紧了呼吸，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因为起诉书把开封所有的武斗死伤的责任都堆到我一人身上，不了解实情的人看了自然会为我的生命担忧。但我清楚自己是无辜的，也做好了各种准备。当晚照旧倒头便呼呼大睡，给狱友留下深刻印象。

12月26日，我接到对我的判决书（1979汴法刑字第365号）——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决书写了长长的四页，而且指控我“拒不认罪”。我怎么认罪呢？比如指控我1967年7月指挥人民会场武斗，武斗引起与“八二四”无关，我们一些人去解救“二七”被围人员，也不是我派的，唯一“根据”是说我“派周兵向黄泽生传达命令，向人民会场发动总攻”。但同是开封中法下达的、黄泽生的判决书中却根本未提我向他传达命令的事。这说明开封市中法本来就知道我是冤枉的，但照样判决。我当时签了反对意见，并写了上诉状。后来省高法裁定维持原判。1980年初，省高法院长丁石到河南省第三监狱接见我，他说：“我们并不是非要判你们这些学生，关键是你态度不好，你要向***学习。”仅仅态度不好，不该判刑也要判吗？但那时向谁讲理呀。

判决书下达后，看守所安排一次与家属见面。看到多年未见的妻子，想着她这些年因为我所承担的压力和苦痛，忍不住热泪滂沱。我说：“这一次年数长，不是一年两年，不要再等我了，该走了……”妻子反倒很镇定，她说：“快别说这些！原来传说你要杀头，或者判无期，现在判二十年，总算有盼头，我等你！你不要流泪，我都不流泪你流啥泪！”

七十年代结束后，我被送到禹县河南省第三监狱——中国夏朝第一个监狱“钧台”遗址所在地，在四围大墙中度过了整整十年，那是我的八十年代。

青春与歌舞

郑丹

郑丹，1948年生于贵州省大方县。毕业于贵州省艺术学校，现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北京市舞蹈家协会少儿舞蹈委员会负责人、太阳花少儿舞蹈艺术团艺术总监。

那大概是1971年初冬天的事情。

我身怀六甲，即将临盆，于是向组织上告假回家待产。想不到军代表找我谈话，说等你休完产假回来，我们这边的运动也结束了。你，有什么想法？

从省艺校毕业之后，我便被分配到贵州省杂技团乐队担任二胡演奏员。我到省城工作和生活，时间不算长，不过两年多。那时候正赶上全国文艺院团进行斗批改运动，我们团和省黔剧团被分到一个组，由军代表带领，下放到晴隆县一个偏僻的农村里进行思想改造。

经过了近两个月的整风、学习和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反省，上面希望看到我们脱胎换骨的新姿态，这时候军代表问我的想法，我说，我想好了，自我改造，要求下靠地方，到基层我的老家去。

我的表态让组织很满意。然而改造归改造，人情归人情。私底下同事朋友们个个惊讶，纷纷背着领导来说我傻：人家都是争着往省城调，你下靠了，想调上来就难了。还有朋友忧虑：你到下面去，那你的专业不是就丢了？

无论什么时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都是人之常情。我从偏僻的小县城考入省城读书，还分配到省里的文艺团体工作，这在大多数人看来无疑是麻雀变凤凰了，现在要返回去做麻雀，可不算傻瓜么？

但是，离开省城下放，对我来说并不是多么痛苦的选择。家乡有我全部的亲人，何况爱人——那个年代，夫妻之间大家都习惯称呼为爱人——大学毕业后被分回家乡一个农村中学教书，我们分居已经很久，由奶奶带着的儿子还小，现在女儿又将出生，我回去显然更为现实。说到专业，我们天天在这个村子里，不是学习、批判，就是看着小煤窑里时常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不断抬上人来的惨剧，不也没有什么专业可说？

下去就算是当个音乐老师，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也好——我这样想的。

文艺要到广大农村群众中去

我没想到，我的回乡竟让县委宣传部长那般的欢喜。他马上把县文化馆馆长叫来，两人都很兴奋，说你来了，太好了——我是那个小县城里来的第一个科班毕业的艺术专业人才。

文化馆刚刚成立了农村文化工作团，是在原来县黔剧团的基础上，再招收了一些有文艺才能的中学生，还有分配到农村的大学生组成的，正缺专业人才，尤其是编导人才。我一去，不由分说便成了编导。

在学校我学的专业是音乐。当时国家要求文艺院校的学生必须一专多能，我们在校都学习过舞蹈、表演的课程，但是专业的编导，我还真不会，可是还有谁

能比我更“专业”呢？我只能拼命去看《东方红》这样的电影来学习。

就这样，我成为文化馆里的“一把抓”：舞蹈、歌剧的编导，乐队演奏员，作曲，独唱，兼舞蹈、话剧演员。很快，我的第一个舞蹈《苗家姑娘上大学》也编出来了，演出的对象，便是乡村里的农民们。

七十年代，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广大文艺工作者都要下到工厂，下到部队，尤其是要下到农村去，全国都在学习乌兰牧骑，成立农村文艺工作小分队。我们文化馆成立了农村文化工作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每月必须到农村演出十次以上，另外还要辅导农村文化站的工作。

那时候乡野之间道路不发达，我们送文化下乡，就靠两条腿，大家自己背着演出的服装、乐器和道具，一次下到一个区——现在都改叫乡了，走到一个村子演一场，然后接着赶往下一个村子去。什么时候赶到就什么时候开始演。

演出一般在村里的打谷场上进行，条件好一点的村子，会为我们搭个台子，没有台的，我们在场上围个圈子就开演。我们还专门创作了一个歌舞短剧，就叫《打谷场上》，团里一位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写的剧本，我作曲兼编导，故事讲的就是打谷场上发生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我们创作演出的原则：要结合农村生活，随时随地取材，从农民最熟悉的生活里去创作节目。所谓送文化下乡，并不是一种从上到下的高姿态，而是走进他们，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的节目通常由这样几部分组成：由发生在田间地头的阶级斗争搬演成的歌舞短剧，其实就是今天的小品，只不过那时候不这么叫罢了。我们那里又是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所以歌舞节目比较多，用歌舞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另外我们还演一些贵州花灯，还有些演唱、独奏节目等等。通常这样一台节目足够我们走乡串村地演很久，有时候还边走边采风，有新题材便创作新的节目。

每次我们下去，农民们都特别欢迎，每到一处，漫山遍野都站满了人。听说我们要去演出，农民们老早打着火把就来了。贵州是山区，山多，一个村里的人，在深山野林里东藏一户西住一家的，要到公社看演出，好多人家得头一天就提前赶路。我们是流动演出，路上走着的时间也没有准头，老乡们经常站着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不差，一旦走到地方，看见等着我们的老乡，也顾不得吃饭休息，立刻上妆演出。演完之后，满山坡满场地的老乡久久都不愿离去。那样的情景令人终生难忘！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村子里演完之后，正该赶到另一个公社演出，可是一早就下大雨，行路很难。我们正犹豫之际，那边公社来电话了，说老乡们都赶来了，在雨里等着呢。公社里还特意给我们派来两匹马，专门驮演出器材，说是不能让城里来的“艺术团的”太累了。“艺术团的”，是那时候乡下的人们对我们的称呼。

泥泞的道路很难走，西南山区的黄泥一遇雨，不是一般的粘和滑。一匹马在泥泞中还摔断了腿，我们在雨中赶路非常艰难。已经是中午了，我们才到了那个苗族寨子，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漫山遍野的苗族农民，有的几个人挤在一块破塑料布下，有的就揪块芭蕉叶顶在头上，有的举个树枝挡着，有的干脆什么遮挡都没有，全部在雨里站着，从上午一直等着我们，连午饭也不去吃。

寨子里的人们怕我们受寒，给我们熬好了大锅的红糖姜汤。我们哪里还顾得上喝，立刻给老乡们演，其他的，演完再说！演出是露天的场地，雨不停地下，淋湿了我们的头发，淋花了我们的妆，但是看到下面的观众们笑啊，发自内心的拼命地鼓掌啊，我们也拼尽全力，全身心投入来为他们演出——大概所谓的伯牙对子期也不过如此吧。

演完了既定的节目，农民们全部不愿走。他们拥到台边，用手扒着台子，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不停地说：“再来个嘛！再来个嘛！”雨仍然未停，我们脸上的妆都淋没了，丝绸做的演出服也淋毁了，苗家舞蹈中小花伞的颜料和着雨水滴在我们的脸上、衣服上，花花绿绿的。但是谁还在乎这些呢？我们演，把每个人所有能演的都演出来，哪怕是平时谁会唱个什么歌，都上去演！一直演到天都黑了，我们实在掏空了自己无可奉献，那下面站着的老乡们还是拼命地鼓掌，眼睛里闪着奇异的光芒，扒着我们的舞台不愿离去——那是我有生以来演得最好、演得最投入、与观众的互动最真诚的一次演出！

那天演出完之后，寨子里杀了公社唯一的一头猪来招待我们，最肥的猪肉用辣椒炒了，大片大片厚厚的肥肉亮晶晶地堆在我们的碗上，村里的人们却谦逊地招呼：“老师，吃辣子，吃辣子。”眼里满是真诚，可是都不好意思直视我们的眼睛。

招待我们剩下的肉，公社里每户人家都分到一小块，拿回去熏成腊肉，过年就有荤腥了。只是不知道我们下一次去演出的时候，这一点儿肉会不会又成了招待我们的佳肴。那时候农村太穷了，得一丁点儿肉也不容易，但是每次下去演出，我们总被当作最金贵的客人，村子里总是挨家挨户地找到仅有的一点儿腌腊肉，贡献出来用辣椒炒了给我们吃。至到现在，我一想起老乡们那真诚朴实的招待，心里总会浮现出那一双双不太好意思直视我们的眼睛，在招呼着：老师，吃辣子吃辣子！

农民对我们这样的热情，对文化这样的渴求，让我们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工作有意义。村里的干部经常会因为路不好走，怕我们来不了，亲自赶马车来接我们。有一次因为路滑，拉车的马被别断了腿，长春公社的书记竟然自己充当马力，生生在泥泞中把一大车演出行李拉回了村子，我们只能拼命在后面帮他推车。这时候，大概唯有“拼命”这个词，才能恰好地形容我们彼此间的感觉。他们拼命地欢迎我们，对我们好，我们也拼命地为他们演，走到哪里都愿意去。我们和农民，心是相互贴在一起的，这绝不是宣传上的套话。

我常常会想起，我们演出完了的夜里，睡在村里的大通铺上，看到山间的皎月升起，那么宁静安详，特别美好。经常地，我们每个人这时候都激动得睡不着，——每一次演出完了都睡不着啊！心里满满的，特别踏实，觉得自己又做了些有意义的事。多年以后，我依然从事着群众文艺工作，也感受过成功与掌声，但是至今没有一次掌声、没有一次观众的热情，能够与那时候老乡们的真挚与纯朴相比。

所以，虽然我们每个月都有一半时间在乡间奔走演出，有时一个月都在乡野里回不了城，但是我并不觉得很辛苦，也不抵触，觉得这就是我的工作，而且是有意义的工作。

唯一的缺憾，就是回家太少，年幼的孩子照顾不多。儿子基本上托给奶奶带，女儿还在襁褓里，就常常跟着我上山下乡，演出的时候，不上场的人就轮流帮我抱她。为这个，在女儿的记忆里，至今有这样一幅印象深刻的画面：我们搭上一辆卡车下乡，孩子被母亲扶着站在车厢里，一瞬间看见对面过来的车子煤堆上，坐着从乡村中学搭车回县里的爸爸，夫妻父女就这样，在两辆相向行驶的运煤卡车上相望而过。

轻家庭而重社会，是我们这一代的人生。“五四”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流，主张的是女性要走出家庭，走到广阔的天地中去。解放之后，这个观念实行得更为彻底。对我个人而言，并非家庭不幸福，并非不贪恋家庭团圆的温馨，然而与家

庭舒适同样重要的是，当我真正走入大众在广阔的天地里有所为的时候，感觉是充实的。所以，遗憾，却并不后悔。

把全县的文艺骨干集合起来

七十年代，至少在我生活和工作的那个地方，也许思想单一，文化生活却相当活跃：从县里、地区到省里、全国，每年的文艺汇演不断，元旦、春节、五一、六一、国庆都会有演出；除此之外，全年里歌咏比赛、团体操比赛不断，有成人的，也有学生的；还有各个节庆的文化集会需要举办。这都是文化馆的工作范围，既要组织，也要辅导。我们也因此一年到头忙个不停。

我刚到文化馆不久，正赶上六一儿童节省里汇演，要给孩子们编排一个舞蹈。那个年代的文艺节目，需要教育孩子的阶级觉悟，于是我们便设计了一个农村里的地主婆，假装在玉米地里打猪草，暗地偷公社的粮食，结果被孩子们抓住的故事。这是那个年代里最常规的一种故事模式，有些特别的是，当时主管的领导正喜欢芭蕾，于是说，郑丹，你编个芭蕾吧。

也许今天的人们听说这样跳芭蕾，大家难免哈哈一笑。但是那时候，芭蕾这种西方的贵族艺术，在中国却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普及率，不仅用来表现农民革命、阶级斗争，而且连田间地头的下里巴人，只要想跳舞，都有可能立起脚尖。就在我调回到县里之前，县里一中的学生们已经自己排过芭蕾舞剧《白毛女》了，有些学生就来自农村。那时候的文艺生活，的确有其荒诞和简单粗暴之处，但对应现实回头反思，从分享的层面上说，那又何尝不是一种健康的文艺精神，何尝不是一种今天没有的丰富呢？

全国推广样板戏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机会。《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这样的剧目，在那时除了有电影，还有完整的演出台本出版。里面不仅有剧本、唱腔、乐谱，还有每场的舞台场记，舞蹈精确到音乐每一拍的动作说明都写得很清楚。此外还有舞台调度图、舞台美术图，甚至细到每个人物的造型、化妆和服装，全部标准化地连图带文给标出来。只要照书排演，虽有优劣之差，但大样子差不到哪里去。我靠着新华书店里买的《红色娘子军》台本书，给文化馆的小学员们排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序幕。孩子们把“常青指路”跳得像模像样，演出时极受欢迎。

小孩年龄小，教芭蕾容易一些，我们在小学里选了一批条件不错的学生，训练了一阵，也把原创的阶级斗争芭蕾舞跳出来了，最终在省里的汇演获了奖。那时候的芭蕾舞鞋做得挺漂亮，是我专门到省城买的，平时训练用的是布面的，演出用的就是缎面的了。不过，在我们的概念里，芭蕾不过也就像跳彝族、苗族舞，区别不过是，需要的时候立着脚尖跳，演完也就放一边去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我们的乐队。我们乐队里什么乐器都有，二胡、小号、扬琴、月琴、手风琴、大提琴、小提琴、黑管，谁会什么乐器便奏什么乐器，中西合璧，一派和谐。这可不是我们的独创，那时候演样板戏的专业乐队里就是中西混搭，所以对这种乐队形式我们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或特别。还要强调一下，我们不是大齐奏，还是分谱的，水平不能说很高，但至少没有跑调的。不过最初没有人会大提琴，乐队里少个贝斯终究缺点什么，于是我还自学了大提琴来抵挡一阵。后来同事余凤仙特意钻研了大提琴，乐队这个缺才算补上了。

那时一专多能是普遍现象，常常这个人在台上跳完舞，一下场坐在乐队拿起二胡接着拉；那个人前一分钟还在弹月琴，下一分钟就上台说起了快板书。要说我们哪里来这么多文艺人才？从各处抽调。

我们虽地处偏远，然而从全国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可不少，大学生里人才多，有的会拉小提琴，有的会吹黑管，有的会拉手风琴……许多分配到农村或工厂的文艺骨干，直接就被调到文化馆了，遇到单位离不开的人才，每到文艺调演的时候，便靠县委宣传部直接发函给他所在的单位，抽调到文化馆一段时间，进行排演。那时候大家对参加文艺演出都很投入，所以各单位对于抽调都一概支持。

歌舞演员，我们大多数都是在中学，或者农村文化工作站去挑选有潜质的文艺分子。在城市里的学生，被选进文工团自然算不得多么了不起，但对于农村的孩子，那就是进城吃公粮了。文化馆里有几个演员就是从农村选拔出来的。

说到这里还有一段往事。一位区长，相当于现在的乡长的官，想把他的女儿送进文化馆来。考核过后，我觉得这姑娘形象不行，嗓音和形体条件也不好，就不同意调她。谁知这家颇有关系，因为所在的区盛产大米，就送了当时的主管领导很多大米。那时候大米很稀罕，我们日常都只能吃碎苞谷掺米做的饭。领导被人家搞定，就决定调人。可是因为我的不同意，那家人于是又到我家送礼，还威胁要告我，闹得不可开交。

人家把状告到了县委宣传部，说我打击贫下中农，这可是个严重的罪名。宣传部长找我谈话，说，算啦，你得罪不起人家的。我说，她专业不行，我就是不同意。最终状告到了县委书记那里，书记当即表了态：这种事情我们插不上嘴，要听人家专业的。

那个女孩终究没有调成。农村人总希望进城改变命运，但是不靠自身的才能而走歪门邪道，这样对别人是不是不公平？

放到今天，我一个人的坚持竟然就能抵制这事，那真是奇迹，几乎不太可能。当时，我不过是文化馆的一介普通员工，没有一官半职，就凭我是专业人员的良心，领导就不敢随便调一个人。

充满了色彩的文化记忆

故乡很小，整个县城建在一片东高西低的山坡上，站在南城外塔山上，可以一览全城，而且会担心，它哪天会叽里咕噜滚到西边山脚的河里去。

形容七十年代的这个地方，贫穷、落后、闭塞、单调、压抑，都可能是准确的词。然而为什么我的记忆中，有关文化生活的多彩的感受，会远远深过前面那些准确的形容呢？这是不是因为我在的是一个偏远山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歌舞之乡的缘故？

印象最深的就是少数民族的各种节日，尤其是苗家的节日，什么“跳花坡”、“踩堂”、“探花房”等等习俗，从未因文革而中断。每逢正月十五、三月三、四月八、端午节，都是他们恋爱迎亲会亲家等等的世俗节日，他们跳舞、唱山歌、谈恋爱。唱得好听，跳得精彩，形式多样，热闹活泼，也让我们这些城里人饱了眼福。我们一边下乡为他们演出，一边跟着他们学会了好多东西。

我是半路出家的编导，为自己懂的不多着急，就买了些皮蛋（这已经是我拿得出的稀罕的礼物了），跑到省里去找人，希望人家有机会可以推荐我到专业院校进修。但是人情就是这样势利，我既然“下去”了，人家上面的人又凭什么帮我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最终滋养我的，还是从生活里来的这些少数民族的民间歌舞。苗族人三月三的“探花房”，是苗族姑娘的成人礼，家里会专门为她布置一间花房，闻讯而来的男孩子们，就在她的楼下吹芦笙跳舞，唱山歌逗她。姑娘喜欢谁的话，就邀他上楼，两人唱歌，弹口弦，谈情，再约到端午节的花坡上去。

到了“跳花坡”的时候，姑娘们都缠着自己绣的最精美的腰带出门，小伙子喜欢哪个姑娘，就会去抢她的腰带。姑娘喜欢哪个小伙子，最后就会把腰带挂到他脖子或芦笙上。经历了唱歌、芦笙舞的姑娘小伙们，在山坡上撑起一把把花伞，一对对在伞下谈情唱歌……这些生活里的载歌载舞的场景，直接催生了我1977年创作的舞蹈作品《栽孃》，描写苗族的姑娘小伙子们，如何经过一番歌舞的攀比、试探，最终一双双在花伞下谈情。

就因为这节目是从村民们的生活里来的，《栽孃》的演出效果好极了：小伙子逗姑娘的时候，大家都在下面起哄；斗芦笙的时候，他们真的当起了裁判；当小伙儿认错伞底下的姑娘，大家哈哈地笑得特别开心；当有情人一对对撑着伞远去的时候，大家凝神摒气，过了很久，才热烈地鼓掌，拼命地鼓掌。

这个节目的创作和演出，是跟他们最好的交流，一边演出一边采风，让我们汲取了最丰富的民间文化的营养。

还有，经常伴着我们走在乡间的，是山野间脆生生、火辣辣的山歌。生活在那地方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走在路上从不会寂寞，走在哪里，都会有人唱山歌，有时候自己抒情，有时候同你调笑。

有一次，我和同事小潘正在去文化站辅导的路上，忽然听见山上正在收割的农民唱起了山歌：“城里姑娘么下乡来，脚上穿双么白球鞋，胶线包包么装少午哇，包子馒头么露出来——”

那时候，最时髦的鞋大概就是白网球鞋了。另外，我们那时的年轻女性，时兴用彩色塑料线织成花包包来背，“少午”是当地土话，指的是下午加餐的吃食，实际就是我们背着在路上吃的干粮。一听这歌就是成心拿我们消遣呢。

小潘是个反应很快的女孩子，立刻和了原调原韵唱了回去：“乡下姑娘么进城来，脚上穿双么水草鞋，麻布口袋么装少午哇，苦荞粑粑么露出来——”只听见对面山上嘻嘻哈哈一笑，就没声了。

因为念及乡里人生活太苦，我常常觉得这个回敬的对歌，有点像是嘲笑人家，但是那一来一往的对歌和调侃，又有说不出的亲近和幽默。这样的对歌，我们一天总能遇到一回。

最擅长唱歌的是赶马的车夫，我们那里称之为“马哥头”。“马哥头”们赶着马车，路上消解寂寞的最好方式就是唱歌，一路看见什么唱什么。最爱逗路边的姑娘，唱得人家脸红心跳，或者停下来骂人拿石头丢他，他便哈哈大笑，快活地逃走。

还有一次，我们走得太累了，很运气，搭上了一个马哥头的空车。那天雨后新晴，山青水绿，天地之间一片安静，只听得马蹄在路面上“踢踏、踢踏”的声音。路上，远远的桥边有一家烟酒小铺，马哥头突然敞开了歌喉：“哥家住在么大桥边，又卖烧酒么又卖烟，有钱来么你喝杯酒啊，无钱来么你咂竿烟——”

悠长的歌声飘荡在青山翠谷间，荡出一声声的回音，说不出的和谐美好。我们也忍不住跟着他，一声一声地唱着，享受着悠悠山谷外远远传来的回音，仿佛天地在与我们对话。

这位马哥头歌中唱到的糖果烟酒小铺，那时候在县城里，或者马路边，都很常见。赶路疲惫的人们，常常靠在铺子边，打一杯水酒喝，或者卷一支纸烟吃，几毛钱几分钱的，丰俭由人。这样的情景，曾经是那个小县城经年不变的图画。

我其实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有那么多人擅于唱山歌。我的母亲就是极会唱的，她有一把小二胡，还有一把只有一根弦的月琴，她都会演奏。但是她最爱弹着那把只有一根弦的月琴唱歌，独自唱着《苏武牧羊》什么的。每

到端午节，城北桥头的古银杏树下，总聚着一群人在那里对歌，每每的，我母亲总是最后唱赢的那一个。

七十年代，我们过节的风俗并不因贫穷而省俭，每当我们一家人，喝完雄黄酒，吃完晚宴，依着传统习俗“游百病”走到城北桥头的时候，总听见人家喊：“哟，你家郑玄娘又唱赢了！”母亲看见我们，便会跑过来抱住两个外孙，说：“玄，我的乖儿，你们来了！”招呼完我们，她又会回去继续对歌，直至午夜才尽兴而散。

或许就是这些从不消散的文化传统给了我们丰富的文化生活。端午是这样有趣，春节元宵更是热闹。除了那些传统的娱乐项目，和必不可少的文艺演出之外，我们文化馆还配合节日，组织很多文化活动，比如年年春节至元宵的灯谜大赛和舞龙的表演。

我爱人是猜谜的高手，这样的猜灯谜活动，通常的奖品是烟卷和糖果，这让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因为常胜，学会了抽烟。有了孩子之后，他都觉得自己去猜谜是欺负人，但又丢不下好玩之心和那点奖励的香烟，于是就让孩子们去看了灯谜回来，他告诉孩子去领奖。

灯谜由文化馆的人四处搜集，或自己创作，都用毛笔写在五色的彩纸上。一串串的彩纸挂在绳子上，挂满了文化馆的院子和排练场。人家见两个学龄前儿童老是扯了灯谜彩纸去领烟，都觉得不像话，仔细一看恍然大悟：“难怪，刘扬忠家的嘛！你家爹咋会不自家来？”我爱人还一直取笑那些灯谜出得没文化：“神拿石头打人”猜一词牌名，谜底是什么？“菩萨蛮”！

元宵的舞龙是文化馆组织的一项重要活动，都是夜里才舞。大龙灯扎得漂漂亮亮，还有鼓乐队敲敲打打。跟在公家龙灯后面的，是爱玩的百姓自己扎的“草把龙”，没有公家的亮眼，却在上面插了很多点燃的香，舞起来也是一团红线，让人眼花花的。

有几年为了增添舞龙的绚丽的效果，在大十字、小十字这样的重要街口，都有烧得旺旺的火炉，里面熬着铁水，用勺子盛了火红的铁水，用木板在勺子下猛向上一拍，铁水散向空中绽放开来，如同国庆礼花一般好看。可惜好是好看，祸害可不小。那铁水往往还没冷却就撒了下来，慌得底下看热闹的人群，又是叫又是躲。我倒不记得元宵过后有多少人说被烫的，只记得小女儿后脖子里落了个铁粒，烫了个大水泡，好几天才好。后来大概撒铁水劳民伤财，就不用了。再后来，不知为什么，舞龙的表演也渐渐没有了。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慢慢马路多了，房子多了，汽车多了。路上的“马哥头”越来越少，路边的烟酒铺都变成加油站和超市，渐渐也就听不见马哥头的歌声了。不知道是不是出去打工的人多了，山间调侃路人的歌声也稀少了。母亲去世了，早在她去世之前，端午城北的歌会也不见了。春节的灯谜会猜的人越来越少，规模渐渐小到没有了。我离开故乡太久了，听说苗族的“跳花坡”等节日，在这些年倒是越办越大，成了当地一项重要的特色活动了。

我们县城依然挺立在那斜斜的山坡上，从未像人担心的那样，滚到西边山脚的河里去，只不过原来破旧的茅草屋和青瓦白墙的房子，全部变成了一样难看的水泥楼房。

那个地方小归小，却有一个豁朗的名字——大方。

因为单纯，所以快乐

1975年，我爱人终于从农村中学调到城里的师范学校教书，我也一同调去

当音乐老师。可是，这并不是我的群众文化工作的结束，而是我以师范学校为阵地，又开始了新的文艺工作。

师范学校对我的工作百分百信任和重视，没有教材我就自己编，没有乐器就给我经费。我和爱人带着女儿专门去省城和四川采买了一趟器材，什么笙啊、扬琴、手风琴、二胡的，买了一堆回来，再买本教材就教学生练乐器。

当地的文艺汇演十分频繁，自从我去了师范学校之后，就把学校的文艺活动搞得非常红火。而且，由于我们夫妻同一单位，似乎更有了夫妻合作的意思。每次演出我们都有新作品，我作曲，爱人写歌词，唱《送红军》之类的歌。那时候跟红军有关的歌曲都比较抒情，旋律好听，像《长征组歌》、《映山红》什么的，我们那时候的写歌风格也走的是那种路数。

在每年全县的各种文艺汇演中，师范学校的演出总是力拔头筹，质量最高，也最受欢迎。每次演出不是在经常举办篮球比赛的球场坝，就是在老电影院，有时候也会在县委礼堂。每次演出都挤满了观众，这时候，也是门口卖瓜子的小摊最赚钱的时候。县城很小，大家又都爱看文艺演出，一旦你粉墨登场，台上的“光辉形象”到第二天就会成为一条街上八卦的话题。

那段时间我偏好排演歌剧，给学生成功排演了歌剧《江姐》的片段之后，又排了部叫《刘四姐》的小歌剧。为了保证演出的质量，这次是师生同演，我自己扮演深入虎穴的女游击队长刘四姐，我爱人在中学大学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就由他扮演剧中第一反角肖司令。剧中肖司令最终被刘四姐一枪结果了性命，于是八卦来了。演完之后，全县都在说那个“刘扬忠一枪被他家婆娘打死”的戏，弄得6岁的儿子气呼呼几天不理我们，死活不肯再看那个演出，连演出后发的糖包子这样金贵的东西，他都不肯吃。

我们的演出，服装、道具、舞美，无一不出自自己的手笔。那时候演出服都讲究，大多是丝绸做的，我们自己买了料子和花边，自己设计样子请裁缝做。耳环就自己买珠子串，没有人打耳洞，就拿线串着，挂在耳朵上装样子。盒子枪都是我爱人的手工，自己拿木板画了样子锯好，打磨之后用墨汁涂色，简直可以乱真。

其实，在那个文艺活动如火如荼的年代，我们小县城里哪个单位演节目不是如此呢？那时，个个敢表现，也个个都是文艺多面手。

儿子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他们学校校长请我帮他们学校排演一个节目参加汇演。我爱人便拿孩子们最爱看的一本小人书《会摇尾巴的狼》，编了一部童话歌舞剧，我给他们谱了曲，编了舞，把5岁的女儿也拉进来演了小白兔。演出很成功，一家四口以这样的方式圆满地合作了一回，大家觉得上台演出是天经地义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若是换到如今，我还会有这样的勇气么？即便我有，家人孩子们恐怕都不会那么配合了。

今天，我不需要证明自己在那个年月多么的有头脑，或许正因为简单，人没有太多的杂念，所以有最单纯的快乐。那些年，我从来没有因为排演节目取过报酬，也从来没有计较过自己付出的比别人多还是少，没有担心过自己是不是太出风头的问题。我安心于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这个工作让自己、让周围的人、让台下的观众都感到快乐，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这大概是我对那段岁月缺乏痛苦记忆的原因。

1976年的一天，我正随着文化馆在地区进行汇演。演出进行了一半，突然听见外面高音喇叭响了起来，人群在欢呼，一向对演出极为专注的观众开始呼啦啦往外跑，这让台上的我们莫名其妙。突然有人对我们大喊：“别演了，中央出

大事了！快出来吧！”场内人全部跑了出去，我们化着妆穿着演出服也从舞台上跑了出去。

出去才知道，“四人帮”倒台了。消息太震撼，新闻中欢快的气氛激动了我们，大家都在欢呼，不知道怎么表达才好。我们想起来后台有锣鼓，便跑回去拿出来敲锣打鼓开始满街游行，一边走一边喊“打倒四人帮，全民得解放”。

那真是惊天的大事，我们接下来几天的演出中，在演出的间隙里也激动地讨论个不停。那一年的悲伤和惊愕太多，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有这么快乐的消息作为结束没什么不好。

那狂喜的气氛延续了很久。很多从前不让放的电影，开始反复放映，广播里，像是要把从前没能放的歌一口气放完，满大街都是欢歌笑语的。我们家也借了个朋友的唱机，一天到晚大喇叭里放着文革前的老唱片，还有不少那时出品的红色塑料薄膜唱盘。方圆百米的街坊邻居都跟着我们天天听音乐，倒也没有哪家嫌吵的。

我们的文艺演出也变得更加五彩缤纷。那一段时间里，由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演了很多出话剧，剧本很快刊登出来，于是我们紧跟潮流。

我又被调回了文化馆，开始主演话剧。我们一口气排了《深夜静悄悄》、《于无声处》直到后来的《权与法》等一批新时期话剧。西南人普通话说得不好，憋着一口方言普通话演戏，经常笑料百出，无论是观众还是我们自己，有时会笑场笑到演出无法进行。但是演出还是非常受欢迎，于是我们文化馆毫不含糊地做了两三年的话剧团。当然，区里省里的汇演，我们唱歌跳舞创作依旧不耽误。

1978年春，我丈夫在他爷爷的葬礼上收到了研究生录取的电报。这是个对我们全家都影响重大的消息，几年后，我们都跟随他离开了这块文艺活动格外活跃的土地。1983年，我原单位的同事到北京参加全国乌兰牧骑文艺调演，我原来参与编导的一个仡佬族风情歌舞《打亲敬酒》获了奖，他们给我送来一个奖品，是一盏台灯。

后来不太听说有全国汇演的举办了。我原来的单位，据说也逐渐散了，家乡的文艺汇演渐渐也没有那么热闹了。

我与丈夫的合作终究成为一段过去了的往事。我们最后一次合作，大概是在1977年秋天，那时候政府曾经想向全国征集新的国歌，县委宣传部领导很郑重地把我们夫妻叫去，让他写词，我谱上曲，然后送到上面去。到底写了些什么，如今我完全不记得。就像今天，很多人都不记得，我们一度差点把国歌换掉。

但我不会忘的是，那个过去的年代，我有过毕生最真的演出，最好的观众。时时想起，还分外怀念。

（郑丹口述，刘净植文字整理）

草原

秦晓

秦晓，1947年生于山西，在北京长大。1968年到内蒙牧区插队。改革开放后，曾任中共元老宋任穷的秘书，后进中信集团任总经理，继而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长。现为博源基金会理事长。他于2002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五十多篇论文，并出版专著多部。

我插队的地方是内蒙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额尔乌登大队，属边境二线。

“文革”中我在北京四中被打成“反中央文革小组分子”，扣在学校，准备后期处理。是我约了几个同学自己跑到内蒙去的。我们安置下来已是冬天了，分到放牧小组，跟老乡一起住蒙古包。老乡特别热情，把我们看成是北京毛主席派来的人。大队分两派，跟家族渊源有关。我们刚去时是一派当政，后来又由另一派当政，翻来覆去，说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其实都是家族斗争。

寒冷

内蒙草原给我的头一个印象就是冷。我们穿的是皮裤、皮德勒（皮大衣）、毡靴子。皮德勒是用七张羊皮做成的，很大，穿在身上，下摆拖到地上，系上腰带，怀里还能揣很多东西。蒙族人就是靠这套装备世代度过寒冬。问题是捂得再严实，在外放一天羊，冷风也给吹透了。

放羊归来，回到蒙古包，喝碗热茶，吃顿热面条，才能暖和过来。蒙古包中间是烧牛粪的灶，烟筒从伞状的顶蓬伸出去。晚上不断添加牛粪，才能保持温度。睡以前得把牛粪烧得通红，没有烟了，用布垫撤下烟囱，盖上顶蓬，全靠灶里的余热入睡。

牧民冬天睡觉从来不脱衣服。蒙族人睡觉有标准的姿势：先把腰带解下来，皮裤脱到大腿上，“皮德勒”披在身上，先趴下，再转身，身边的老太太帮忙把四周掖好，就不能再动弹了，整夜不得翻身。刚睡时还暖和，到了半夜越来越冷。早晨醒来，家庭主妇先起来烧茶，火也旺了。起身先提皮裤，系上腰带，享受美味的奶茶。

夜里上厕所可是大事。蒙族人无论男女，都是就地一转，把袍子摊开蹲下如厕，既遮羞又挡风。有时到蒙族人家作客，主妇在那儿蹲着跟你打招呼——唉，你来了。等她站起来才知道她在撒尿。转袍子可是世代相传的技术活儿，我们学不会，于是大便时先互相鼓励，然后找个偏僻草高的去处，把“皮德勒”顶到头上，下边冻得要命。旁边还有狗等着吃屎。冷时撒尿落地就成冰。

我们刚到不久，有一天早上醒来，就像睡在雪地里，枕头被上全是雪。原来头天晚上没盖上顶蓬，大雪落进了蒙古包里。

由于缺乏常识，我们洗好衣服，顺手系在蒙古包的棕绳上，怕风吹走，还把衣袖系成疙瘩。老乡见了，问这是干什么？我们回答晾衣服啊。老乡说，你这衣

服明年五月份再穿吧。再问为什么，他说，衣服冻上根本解不下来，硬要解就得弄破了，只能等到明年五月化冻了你们才能穿上。

至于生活用水，夏天从井里打，到河边拉。我们用装着木桶的牛车去拉水。冬天在河里凿冰，或化雪。家庭主妇的职责之一就是要把雪水融化，再过滤掉稻草和牛粪。有一次，我们到一户牧民家吃饭。我坐得靠里，光线暗，接过一大碗面，呼噜呼噜吃着，赶上个硬梆梆的东西，像肉，可怎么嚼都不对劲儿。我恍然大悟，这是冻硬了的牛粪。

我们那里没有小队，也没有村的概念，而大队的面积纵深约摸一百多里。冬天骑骆驼，夏天骑马——冬天马没青草吃，而骆驼养了一夏天，可换着骑了。“知青”住得很分散，有时候大家聚聚，离得远，非骑马才行。有一次过年，我们去看望一个“五保户”老太太，准备和她一起包饺子过年。我们带着案板、菜刀和肉，赶着马车过去。过河时，那匹马怕冰，惊了，把我和三友摔下来。这马惊了一路，最后把那辆车也甩掉了。我们紧追慢赶，怎么也追不上，只好第二天骑着马，一直走出四十多公里，终于找到散落在雪地里的刀和擀面杖。回来再看那马，精瘦，弱不禁风，正在那儿吃草。

每次回北京，先从大队骑马走十几公里路到公社，再从公社坐汽车到旗里，班车每七天一趟。然后从旗里坐长途车到赛汗塔拉，中间还要住一晚，再从赛汗塔拉搭乘从二连开往集宁的火车，经大同转车回北京。而上火车前的这段路全靠搭车。搭车就得求那些粮食局或商业局的司机，酒肉伺候。汽车司机是草原的“王爷”。那些司机整天喝得醉熏熏的。早上发动车，还得由我们来摇。驾驶室的空位只让女的坐，我们只能披上大皮袄坐车斗，顶着漫天大雪走上两天。

放牧

我们的劳动方式是分散放牧，两三户为一个小组，负责一群牛羊。男的放羊放牛，女的守夜。我在内蒙四年，基本上都住在牧民家，我放过牛羊，打过井，种过莜麦和蔬菜，垒过羊圈，除了牧马，什么活都干过。

我们开会，包括学习、念文件，都说蒙语。蒙族牧民文盲多，文件都由我们这帮“知青”念。不过我只会说，不会念。

队里评工分，跟评先进分子差不多。晚上大家开会评议，谁思想觉悟高，谁工分就高，而不是按多劳多得的原则。我们“知青”吃的是商品粮，每年都发粮票买面。至于钱，是按工分发，我头一年赚的钱，按当时的标准不算少，除去生活用品，还够回北京的路费，不用家里任何补贴。虽说环境恶劣，但生活水平比许多农区要高多了。孔丹在陕西插队，孔栋在山西插队，哥儿俩都很穷。我们还约上他俩一起去井冈山和黄山。当然也得钻点空子，一张火车票用过再寄回，两人用。

那时父母都被关押着，工资也扣了，每次回京，都让我给家里带肉和黄油。插队一年多，我第一次回家探亲。爸爸刚放出来不久，他在厨房一边做饭，一边问我在内蒙的情况。我讲着讲着，发现他做菜只有一小碗肉末，而我们在内蒙都吃大羊腿。这点肉够谁吃啊？我不好意思说，继续回答问题。爸爸炒好肉末，把大部分搁碗里，放进柜子留到下一顿，只用一丁点儿炒豆角。

我在内蒙被狗咬过一回。多年后，在香港见到铁板神算大师董慕杰，被他算出来了。他给我写下的就是“被狗咬，天注定”。

那年冬天我去打井。内蒙地层冻得很深，不用护井，头天点燃牛粪化冻土，第二天挖化开的土层。一天擦黑时分，我拉牛车到牧民家去讨牛粪。刚巧那家没

人，他家的狗刚下了一窝狗崽。牧区的狗只认蒙族打扮，而我那天是汉人的短打扮，腰里系根草绳。那狗欺生，一开始就狂吠不已，起先我没当回事。接着它对我呲牙了。我手无寸铁，边轰边退，最后退到蒙古包，谁料到就在我扭头开蒙古包门的一刹那，那狗扑上来。我身穿皮裤子和短皮袄，本以为咬不到肉。可那狗先咬住腰部，把我拽倒，再把裤子撕开。我双手抱头，两脚乱蹬。远处的牧民赶过来，敲着簸箕，终于把它按住，可还是咬了我的屁股。狗嘴是最脏的，被狗咬过的地方永远好不了，一到气候变化就会发痒。

更可怕的是当时正闹狂犬病。据说有条疯狼下山，把一头猪咬伤了，猪疯了，又把狗咬了，于是我们那地区的狗就得了狂犬病。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几个人被咬了，其中一个是我们大队的能人。他有条狗，跟他关系特别好。每次牧马回来，那狗都跑上去跟他亲热。他妈妈在当地也很有名，年轻时也是牧马能手。一天，他妈妈告诉他，你的狗不对了，眼睛发红。他不相信。第二天他再跟狗亲热时，那狗就咬了他一口。他知道在正常情况下那狗是不会咬他的，就果断地拿起马棒把它打死了。他顾不上跟他妈妈说话，立即骑马跑到县城打了狂犬病疫苗。而他打的是医院的最后一针，等我到医院时，他们告诉我药用完了，劝我赶快回北京。我回到北京。那时北京早就把狗全都灭了，医院根本没这种疫苗，最后还是到药品进出口公司买到的，带到医院每天一针，连打十四天。我在家查了一下书，狂犬病潜伏期是十四年。我那帮朋友们纷纷来看我，有点儿告别的意味。

草原上的狼是很凶残的。不像狮子和老虎以家庭为单位，狼是群体的，但没有得到头狼地位的公狼则不能与母狼交配，性压抑造成嗜血的本能。狼晚上来吃羊，把羊圈走，圈到山上慢慢吃。刚去不久，有个“知青”发现她放的羊少了，我们都很紧张，把羊都赶进羊圈里一只只数，少了几十只，况且还是“自留羊”的羊群，这是牧民的额外收入。这事就大了！我们到处找。后来，老乡说，你们的羊被狼圈在山上了，天气好还可以看见。等我们赶去营救，发现有的羊已被吓死了。

还有一次差点儿被蛇咬了。我住在老乡家，旁边是一个孩子和一个老太太。我刚睡着，感到手上一凉，顿时醒了过来，心想是不是孩子碰到我了？我马上反应过来——是蛇，立刻爬起来，跟老太太说有蛇。她点上灯，把我的被子一掀，一条蝮蛇就趴在那里。内蒙的蛇基本都是毒蛇。天冷，它就钻进我被窝儿。老太太把孩子叫起来，他们要从小教育蛇是害人的。老太太就跟农艺师似的，用火筷子把蛇夹住，挑出去，当着孩子的面打死。

要说另一“劫”，是差点儿被铁丝勒死。那天我到公社参加一个婚礼，快结束时，出来给我的马饮水。我骑马来到公社的水井，没注意到井旁有根晾衣服的铁丝，我骑马遛跬，陡然间，铁丝勒住了我脖子。幸好马有感觉，站住了，可我还是被勒在那里下不来。我紧紧憋着气，我的马似乎明白了，往后倒了两步，我这才下了马，胸口好像要炸开似的。我趴在马鞍上使劲踩地，大约二十多分钟才慢慢吐出气来。脖子上一层皮被勒掉了，全都是血。老乡帮我抹上不少香油，说是消炎的土方。

反思

到了内蒙后，我发现我的适应能力挺强，精神状态也很好。说实话，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想到以后还会回北京。

当然也遇上不少涉及前途的问题，我是基于民兵，有短把卡宾枪，因为背长枪骑马会蹭马屁股。我放羊放牛都背枪，而且还要参加训练。后来，内蒙清理“内

入党”，我被调到盟里搞专案。有一天，负责搞专案的人找我谈话，说现在队里生产很忙，让我赶快收拾东西回去。后来才知道，他们到我上过的北京四中外调，学校说我们几个是反“中央文革小组”的，有政治问题。于是把我专案组的差事给免了，枪也缴了。

那时候，对理想主义的改变和破灭，[开始有了](#)理性的思考。我们会想很多问题，关于文化革命，关于毛泽东，关于林彪（特别是他出事后）。我们常常与一帮朋友讨论、[通信](#)。

读书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那年头找书很难，幸好我妈妈有个同事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在我早期阅读中，我最喜欢的一本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不仅反复读过，给同学写信还引用过其中的话。罗曼罗兰讲的是“呕吐论”，他说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这是一种科学、理性的思想。我也认为自己需要呕吐，很多东西是值得批判，需要反思的。还有一本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讲述的是爱情的力量。在看此书前，我对爱情并没有什么感觉，看过深感震撼。还有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讲了两代人的思想差异与感情。我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和父辈不同的世界，需要有一种新的思维。这三本书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后来还读了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猎人日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都很让我着迷。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和雨果的《九三年》，我就不太喜欢了。

当时的内部书籍包括“灰皮书”、“黄皮书”和“白皮书”，我们都设法找来看。黄皮书是小说，优秀的作品有《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等，还有一本苏联的《这位是巴鲁耶夫》，是意识流的现代作品。“灰皮书”是政治类书籍，像《托洛斯基传》、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等。“白皮书”主要是史料。

那时我们对“中央文革小组”，对毛主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和刘进、三友开始议论毛主席了，说文化革命搞得那么乱，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武斗，把过去的基本队伍——广大干部和工人阶级打成保守派，已经不仅仅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了，跟他本人有很大的关系。刘进当时说过一句话，虽没有直接提毛主席，只是说反正什么事都是“他”对，实际上就是从根上质疑。我们都很赞同她的观点。到内蒙后，我们开始读马列的书，就是想看看毛主席是不是按马列所说的去做的。当时还受到了批评，说你们为什么只读马列的书，不读毛主席的书。

“九·一三”以后，我们看得就更清楚了，到我们这儿来的“知青”也越来越多了。我们一块唱歌、喝酒、聊天。与外界的交流多是通过写信，然后回北京时聚会。我那时在信里写道，我现在只认同毛泽东的《实践论》，把它作为一个认识论、方法论，别的都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这信在朋友之间传看。后来三友说，你一定要烧掉。赶上“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看形势不对，这信会要了我的命，于是就销毁了。

我们更多地不是从个人的遭遇和恩怨出发，而是从一代人、从整个社会去思考问题。虽然生活在草根的环境中，但还保持着某种精英思想。同时，把“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作为体验与感受真实世界的实践。朴实敦厚的牧民，为我们树立了人生榜样，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牧民中真有能人，从没学过什么无线电，可半导体收音机坏了，让他鼓捣一下就好了。后来大队买了汽车，他居然也能修理。

后来我回过两次牧区。有一次是带我女儿一起去的，她是在国外长大的。我

们爬到我们大队的山上，放眼看去，无边无际的草原，好像大海一样，云影漂移，与放牧的牛羊交错呼应。女儿说：爸爸，你们这儿的老乡和一起插队的朋友都是好人，与那些拥挤恶斗的地方形成对照，可能跟你们在这样的草原上生活有关。这里让人心胸自由开放。

韩国新锐诗人五人集

金言的诗

金言(Kim Un), 1973年生于釜山, 毕业于釜山大学产业工学系和国文学系。1998年获“诗与思想”新人奖, 由此登上诗坛。诗集有《呼吸的坟墓》(2003)、《巨人》(2005)、《写小说吧》(2009, 获该年度“未堂文学奖”)。

关于蛇

我们好像没有任何话好说。

我们似乎怀有一种普遍的幻想。关于舌头。关于舌头磨出来的路。对所有带光泽的蛇似乎也都应该做出同样的结论。舌头蠕动的瞬间

语言流逝而过。朝着空气

我们侧耳倾听, 音乐流逝而过。我沉溺在空气中挣扎, 我们又一次谈论听过几次才明白那是音乐时的表情。

我们寂寞地谈论每一个瞬间。关于蛇。

关于音乐和悲鸣, 用分成两瓣的舌头述说。我们披着从睡眠中醒来堆在枕边的蛇的兄弟整日行走。特别害怕时总有带上帽子的习惯。只要脱壳就会脱发。吐着分成两瓣、三瓣的舌头, 蛇爬过去。为了摘下帽子。

音乐流逝而过。我陷在蛇里不断地挣扎, 你却显出一副为了拿起帽子而辛苦的人们所有的一切表情。我们似乎没有任何话好说。关于蛇。

我画了一会儿蛇。

被关在嘴里的人们

我把所有一切东西的触觉倒立起来。争分夺秒的伦理的争吵从我的嘴里泛生。如果有谁死了那一定是由于我的舌头发错了音。他因为一个差错玩弄了我的舌头。

一个人的不够准确的发音使一个苦于洪水的城市瘫痪。由于过多的降雨, 一具死尸漂流而去。为了成为暴动的一部分我来到这里。

所有一切发音和憎恶在噪音中蒸发。我也可以代表所有的人闭上嘴巴。下定决心的瞬间，人们都会把嘴闭上。不，也可以去死。如果不然，那么说的一定不是这个城市的话。

他从谣传中归来。到处充满了只要闭上嘴巴立刻成为事件的人们。为了成为群众的一部分我来到这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想成为事件的一部分，或许我只是在听。就像耳朵里积满的唾沫。

我用多种方法来占有街头。有一些人家已经提前把房门敞开。说是我占有我的地。

金经株的诗

金经株 (Kim Kyungju), 1976 年生于全南道光州。毕业于西江大学哲学系。2003 年作品入选《大韩每日》(现《首尔新闻》)新春文艺从而登上文坛。诗集有《我是世上不存在的季节》、《奇谭》、《开解时差的眼睛》等。曾获“今日年青艺术家奖”和第 28 届“金洙瑛文学奖”(2009)。

淡绿的时制

最后一次记下那个房间里荧光灯的寿命 早晨起晚时和指甲长长时的感觉
一样 傍晚寻找睡处等于是头发和云彩的成份相同 第一次拥有眼泪时感觉
到似乎对时制有了一些了解 以往我所理解的时制 是因为受了寒气而卧床
时放在枕边的森林 每当人死去一个便会长出来的云

我在思念与人相会只记住双唇 收集云色的虫子的少女悄悄露给我看的平板
的胸脯和最后露给我看的日记本里的花园似的什么 在那里 需要的是没有
什么开始和结束只是为了寻求慰抚而初次来到的人 幸存的只有不知自己
寿命的花儿们

今天自言自语中的异邦 是在我从未学过的时态里展开的另一种时态 今天
不知道自己寿命的花儿 明天将知道自己的姓名

每一片云朵都在散发着死者头发的气味 就像钻进中国的水晶中去的昆虫的
天真的眼睛似的某一天

钻入人的眼睛里的时差 云抚慰寿命

旅途的疲劳

头一次有女人问我脚的颜色 头一次有女人为我点着香烟

回到家里洗发时 期待有人最后用热呼呼的水为我冲洗 浮现在脑海里的这种时态是躺在从“今天”到“明天”的那个卧铺列车的铺位想起窗外母亲升天的日子，想起患眼病瞳孔变蓝的姐姐把忘在自己的星星上的门放进杯子里摇晃的时间，从出发到抵达的期间在我造的内陆长出的痣

在有人为死去的我洗发的瞬间浮现出的时态 就像头一次懂得了色彩时的感觉，追逐在用鸟儿们的疲劳的血液描画的地图中飞旋的风筝，只在几秒内眺望的视野也许会成为一个遗迹的时间 在那样的夜里乘脚踏船去看到的渡口要洗的衣服犹如最美的羽毛飘动 革命是在水中一边慢悠悠左右摇晃浴池 一边发困的时态 庆幸的是这是一个运送岩石的星星 在那个星星上的别离 是每天晚上一只眼救出另一只眼的眼睛 所以更为庆幸

从“二锅头酒”到“孔府家酒”的酒海 佩里装载着客车穿越而来¹ 一个星星要成为遗迹 究竟有多少只遗族的眼睛必须被推测 又需有多少遗骨被点燃这个行星才得以辨认 用一种第一次懂得色彩的感觉，用一种把双脚伸进热沙里的感觉，用一种为谁洗发的感觉，才能成为只在异质的时态停泊的白夜 从远处摇晃这个星星的血液 为了充满在我的身体里的你献上这篇文章 从嘴里的沙子

金止女的诗

金止女 (Kim Jinyeo)，1978 年生于京畿道。毕业于圣信女子大学国文科，并在高丽大国文科修完博士课程。2007 年以《八音琴女人》等五篇诗作获第一届“世界的文学”新人奖，从而登上诗坛。诗集《跷跷板的感情》获第 20 届“片云文学奖”（优秀奖）。

石耳

这是一个关于长在耳朵里的石子儿的纪录

经历了在耳边结冻的长夜和寒冬 在漫长的岁月里从遥远漂来
衔着时间 匆匆赶来 犹如撞碎的波涛的舌头

¹ 或许暗示一八五三年马修·佩里率美国海军东印度舰队开进江户湾口，以武力打开日本门户。

所有一切声音变成透明的波涛 来我这里堆积重叠
每当搅拌就会一齐改变方向 打着漩涡卷入我的耳朵里，石子儿里

这是关于声音刻下的纹样的记忆

在石子儿的世界里此时 正下着雨
当关上窗户躺下 第一次听到从屋顶流淌来的话语 我不过是一条漂游在
黑夜里的鱼 把身上的鱼鳞一片片剥掉 为了一点点爬着送到屋顶 却无法
送到 屋顶上的声音们都摇摆着尾鳍悠然消失 在雨声挪动太阳的时间里，
我的耳朵被淋湿折断 我不断地下沉 慢悠悠变得坚硬的石子儿又顺着声音
的圆周绕了一圈儿

总有一天就像高耸在山顶被发现的鱼 声音的纹样如同石碑刻在我的耳朵
里

地球的速度

天空犹如长弓弯曲着
在窘迫的黑暗里
如果大地和风和水和火的星座一点点移动
鸟儿们的气囊就会变深

仿佛拖着巨大的重力飞行，把时间的尖锐的嘴巴
插进大地而折断了永恒的翅膀的那些鸟儿们
当想到我们已经无法再活下去时
当犹如通信被切断的卫星脱离轨道时

我们横跨地球之夜
在短暂停歇的被子中咳嗽
彼此递送深情的目光，却只有无声的话语从瞳孔流出
无意中看着映在窗上的面影
很想把头埋入彼此的肩头小睡 可是

犹如肌肉和骨头衰弱的宇宙人
我们轻飘飘地漂流着患着头痛
把饭后一起观赏的晚霞，以及朦胧消失的双手胡乱装进包里，
便要马上穿过这个夜的隧道

犹如不得不飞向什么地方鸟儿们的灵魂
犹如不被任何人留意的地球的速度
将静静地一边恶心着
一边成为以各自的速度冷却的星光

吴银的诗

吴银 (Eun Oh), 1982 年生于全罗北道井邑。毕业于首尔大学社会学系, 并于韩国科学技术院文化技术大学院获得硕士学位。2002 年经《现代诗》登上诗坛。诗集有《塔谢尔大饭店的猪们》。

未必故意

是喝了粥就下雨了吗？是装了病妈妈就做粥了吗？是不想上学才装病了吗？是因为被朋友欺负才不想上学了吗？是因为假装了不起，才被朋友欺负了吗？是一种存在的方式吗？所说的假装了不起。

雨下着 条条大街都充满了慈爱 肚子饿了。杀人了。这并不是偶然的。是因为肚子饿。是年幼的孩子。不必吃惊。那家伙也因为肚子饿哭过。是的，为什么竟然！杀了年幼的孩子。因为比我更软弱的只有那个孩子。雨不停地下着 条条大街都充满慈爱 肚子饿了。把年幼的孩子杀了，做了粥。一边哭一边吃，直到吃饱肚子。不过就是因为怨恨这个完美的世界。

你有过“找画”的体验吗？秋天里，在阳光洒落的长椅上。高跟鞋挂在树枝上 栗子的刺球就驼在刺猬的背上。可是忧郁的你在哪里呢？寻找落叶却只有干瘪了的蚯蚓。有人在肚子中开始敲击我。是你吧？在那里也依然是一个人吗？能够消化的是疼痛而不是存在。所以请千万不要哭，还是一起来寻找只剩一幅的被藏起来的画吧。我的细胞 不再去嚼。

为了寻找苹果树曾经不知所措。猜想它究竟藏在什么地方。我们彼此都曾经希望存在。不，加上你应该是三个人的。学校完全是胡闹，所以不必为旷课担心。把所有的一切全部赶出去。在肚子中蹲下来，一动不动认真地倾听吧。也许可以听见那些藏起来的画的呼吸。问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吗？不是去栽苹果树吗，和你一起。等着瞧。明天！地球将要灭亡。

再一次问你。为了存在曾经摆出一副了不起的态度吗？被朋友欺负过吗？因此不想上学过吗？身体不舒服，或者装病过吗？迟钝的妈妈毫无察觉为你做了粥吗？所以吃粥的时候，雨不停地下起来了吗？然而那能够成为杀人的理由吗？每条大街上不正如此地充满着慈爱吗？

关不上的窗户

窗户敞开着 肉店刚刚送来的肉结着冰 电视依旧轻浮地喧闹 拿出切菜板把切菜刀收起来 不 在那之前先关上了窗户 布兰妮·简·斯皮尔斯的麦克风发生故障用来唱歌 舞台实在太窄 结冰的肉切不开 窗户敞开着，在用来唱歌显得太窄的舞台上她开始跳起舞来 不 在那之前 先关上了那扇通往观众席的门 把肉放进微波炉按动解冻按钮 热气悠然升起 窗户敞开着 她哑嘴的姿态被照相机抓住 不 在那之前 先关上了微波炉的门 在肉挺立的舞台上黄色的灯亮了 接着麦克风通了 吃惊的她发出尖叫 通往观众席的门猛然被打开 微波炉也敞开门 把肉啪地吐出来 从每个半生不熟的部位散发出恶臭 不 在那之前黄色的灯已经消失 她的歌实在糟糕 但那是因为舞台太窄 把肉放在砧板开始灵巧地切割 半生的肉汁从半生不熟的部位流出来 窗户敞开着 她眨眼的姿态被照相机抓拍 不 在那之前肉已经彻底结冰 结束了公演的布兰妮·简·斯皮尔斯打开通往观众席的门 爬进窗户 不 在那之前黄色的灯亮起来 她不知不觉推开肉而占领了舞台 代替麦克风只拿着百事可乐 想眨眼睛而闭上的她的眼睛 再没有睁开 窗户依然敞开着

黄圣喜的诗

黄圣喜 (Hwang Sunghee), 1972 年生于庆北安东。毕业于首尔艺术大学文艺创作系。2005 年经《现代文学》登上文坛。现为“二十一世纪展望”同人。诗集有《爱丽斯的家》。

艾丽斯的家

摇动的水面上映着夜空。
安装着前灯的汽车驶来。
吃惊的影子里跳出身体。

那是一条鱼拿着饭盒小跑时的风景。

家家都闭着眼睛紧锁嘴巴。

几千年来不曾发出过任何疑问。
几千年来不曾听到过任何回答。

在水中游泳的鱼从不怀疑自己是鱼。

沿着灰色的坚硬的电线杆转动。
电线像巧妙的欺骗一样伸长。
母亲在水面上坐下。
紧贴在墙面上屏住呼吸。

给你把鳞剥下来 来呀现在就从水里出来吧。
吃惊的鱼繁忙地鼓动鱼鳃。

至今一次也没有去过的家
今天依然只是遥远
然而鱼却是每天晚上回家
钟表里没有表针。

尸体游戏

女人正在阳台上维修尸体。包装纸上写着刚刚从四五年产的坟墓直接送来。脸活生生地变得陈旧。

把里面彻底淘净的四五年塞进洗衣机里转动。女人在大略脱水后的四五年的陈旧的脸上画上在百科全书看到的四五年式的相貌，然后钻进四五年里。把手指塞入四五年的手指，把脚趾塞入四五年的脚趾。把眼睛对准四五年的眼睛调整焦距后，按动快门。

女人从居民登记证上剥下六〇年的照片，重新贴上四五年的照片。晒在晾衣台上的八〇年，实际上八〇年里的丈夫开始用棍棒殴打四五年，和四五年的女人。

四五年的全身突然被血泡弄脏。这不是还得重新洗吗。女人在四五年中窃笑。这一次是四五年手拿小刀开始挥舞。丈夫在皮肤一片一片绽裂的八〇年里窃笑。巡警们毫不相关地从阳台下走过。推着婴儿车的老奶奶毫不相关地从阳台下走过。亮着前灯驶来的卡车毫不相关地从阳台下走过。没有信来吗，女人在四五年里询问。

丈夫在八〇年里左右摇头。我怎么样，像不像四五年。和四五年一样吧。女人把嘴对准了四五年的嘴提高声音，砰砰蹦跳。从八〇年中脱出的丈夫，钻进仓库干燥的七二年里。不必担心，信应该很快就来。七二年，实际上七二年里的丈夫安慰四五年和四五年的女人。没有地址也可以？四五年问道。是的，没有地址也没有问题，七二年回答。

蹬着轮滑鞋靠近来的小孩毫不相关地从阳台下经过。低身拱背地走来的猫毫不相关地从阳台下经过。没有谁留意女人和女人的游戏。

匿名之诗

——二十一世纪头十年韩国诗歌的倾向

徐东煜

徐东煜 (Seo Dongwook), 1969 年生于首尔。诗人、文学评论家。毕业于西江大学哲学系以及东国大学大学院, 并于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系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95 年分别在季刊《世界的文学》(民音社)和《想象》(生活)春季号发表诗和评论, 登上文坛。诗集有《兰波放弃作诗人的那天》(文学村, 1999 年)、《在宇宙战争中的初恋》(民音社, 2009)。评论集有《差异和他者, ——现代哲学与非表象思维的冒险》、《德勒兹的哲学, ——思想及其源泉》、《日常的冒险》《匿名的夜》(民音社, 2010)。现为西江大学哲学科教授, 季刊《文学世界》编委。

近年来, 韩国诗坛的生产力比之其它任何时期都更令人吃惊。我们之所以说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来韩国诗歌的成果令人吃惊, 其理由并不在于如一般文学史式的记述所限定的所谓树立了“局部性的十年”的个性, 而在于它构筑了接近现代式的生存情况本身的形态。比如说“匿名性”这个概念, 便是解释最近韩国诗歌的最核心的概念(参照徐东煜评论集《匿名的夜》民音社, 2010)。以往韩国诗歌热心于寻找身份, 而其寻找身份多是通过镜子这一媒介得以成立的。如在李箱、尹东柱、徐廷柱的诗中所看到的那样(李箱《镜子》, 尹东柱《忏悔录》, 徐廷柱《菊花旁》)中所看到的。

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的韩国诗人的特征则正在于他们的创作是从打破这种镜子的工作开始的。比如说诗人金敬仁在诗集《一夜的被褥》(2007)中这样写到, “竟然不知道镜子已经死了。(略)镜子令人可怕地立起, 你是从哪里跑来的, 当你们全部破碎之后, 朋友已经开始书写新的乐谱”。作为一种寻求自由的手段, 现代韩国的诗人们选择的是匿名性, 而不是在镜子里反省自己, 寻找身份, 并服从于随同那种身份而来的义务。拒绝与镜子的繁琐的关系即拒绝通过对镜自省来确立身份, 黄圣喜的《艾丽斯的家》(2008)中所收录的下面的诗句明晰地表现了这一点。

不要留恋镜子里的脸。

(略)

什么“你好”? 你到底是谁?

我们的 Good morning 不该是这样的吗?

——引自《镜子和自画像以及巨大的根》

在这首诗中, 文学史上常常登场的那种通过镜子进行的具有代表性的自我反省方式遭到拒绝。对镜子里的脸不再留恋的话者对镜询问“你到底是谁?”明确地对回归自己、树立同一性表示了拒绝。对于镜子不会“直接”为你确认自己的原形, 诗人金尚赫是这样表现的。“不要把脸塞进镜子 / 表情在想看的瞬间即会发生干涉。除非是净心窥视”(金尚赫, 《真相》, 《世界的文学》2009 年春季号)。这里所说的“无法做到净心窥视镜子”, 正是近年诗歌的一种开悟。所谓反省是因为存在“根本性的干涉”。比如说在镜子前的具有代表性行为的“化妆”。化妆者在镜子中看的实际上是他者的欲望(他者的视线)。化妆是把自身系缚于他者的

欲望的媒介。总之，与其说镜子会反照出自身的固有性，不如说是一种使自己从属于他者的欲望的装置。如此，反省行为中所有的并不是与自身的‘纯粹而直接的’遭遇，而是“干涉”。

并不利用镜子这一视觉的物体，而是注意通过听觉性去探索这种“干涉”的真实面目的是诗人金止女。她认为确认自己的身份不只需要通过与视觉相关的镜子，而且更需要通过听觉，即声音来进行。在回归自身的意义上，或许声音更为出色。作为确认自我身份的手段，如使用视觉，那么自然需要镜子，然而声音则随着发声，随时可以得到实现。因为伴随着所有语言的声音，即使是在对他人所发，也不可避免地在现实时间传到自己的耳朵。当我们一旦发声，我们就会不得已地听到自己的声音。从这一点讲，声音在本质上是“自我指称”性和“自我回归”性，以及“自我反省”性的。如果说有什么可以毁坏声音的这种“直接性”，使属于自己的声音陌生化——如果是雅克·德里达(J.Derrida)也许称作“异质性触发”(hetero-affection)，那么它就是“麦克”。金止女的《跷跷板的感情》(2009)中收录的《麦克》，体现了由于声音的直接性的消灭，而使声音以纯粹姿态回归自身变得困难的局面。

我在稍微放大声音说话
对着笼罩在我周围的空气
(略)
对着被推定为我的我
——《麦克》

由于“麦克”这一装置的干涉而无法回归“直接的”我自身。如同镜子不可能再进一步映照出自身的真实一样，从我的声音里接近而来的已经不是明确的我自身，而不过是“我和被推定的我”。此时我只不过是“通过和我不同的声音去爱了谁的谁”(《麦克》)。“我”战战兢兢地把脚踏进所谓的“谁”这个深不可测的空空荡荡的名称里。

如此，由“自我(I)”建立于“自己(self)”之上而形成的个人身份，因自我不再能够回归自我自身而走向崩溃。无论镜子还是声音，都无法把自我与自己捆在一起。由此而出现的便是不再回归个人的、因而不树立同一性(身份)的、“匿名性的”等倾向。韩国诗歌中具体体现匿名性特征的方式丰富多彩。例如在下面这首诗中，它表现为在形成家族关系的某一个项目中的身份不在。

当我们异口同声地 称呼姐姐的时候 / 犹如非人称的主语 / 犹如长长的什么都
无法称呼的名字 / 姐姐无需被解释地坐在那里
——金止女《跷跷板的感情》

这是对当人称不作回应的姐姐，在家族关系中不具有个人身份的非人称的匿名性的姐姐。诗人黄圣喜则把匿名性作为对“姓名”的拒绝来表现。

至死不会有任何名字可以用来称呼我
——黄圣喜《女装的男人四国》(2005)

那么，这种匿名性是否是很不吉利的呢？不，绝对不是的。“没有名字照样温暖地呼吸 / 树木 / 一天几千次，舒展变幻不同的亮晶晶的叶子”(金止女《科哈乌·隆戈隆戈》)²。从这些诗句可见，没有名字，匿名性的力量被理解为孕育出无数亮晶晶的叶子的肯定性的源泉。

² “科哈乌·朗戈朗戈”，地处太平洋的复活节岛上的一种“会说话的木板”。(Rongo Rongo)。译者注。

韩国诗人们生产的匿名性，是摆脱旧有身份赖以生存的一切压抑的秩序，从而走向自由的路程。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匿名性尚且与欧洲的哲学家们曾经共同探讨过的某些概念发生共鸣，如德勒兹(G.Deleuze)的“少数人种(minor people)”和阿加本(G.Agamben)的“残余(remnant)”等。这些概念是为没有身份而在社会上成为缝隙的匿名的东西所赋予的名称。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性的联系里，韩国诗人们对匿名性的省察获得了存在的位置。由此可见，韩国诗歌一直是“政治性的”。

至于我们在这里所读到的金经株、金言、金止女、吴银、黄圣喜等诗人，都是在二十一世纪初通过《世界的文学》进行创作活动的具有代表性的年轻诗人。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诗人们都对超越固有身份的匿名性有所关心。要概念性地展现他们的诗歌的全貌，以及他们的诗是如何使匿名性具体化的，显然仅仅通过这篇字数有限的短文是很难做到的。不过，通过他们的诗中的挑衅性，以及试图超越司空见惯的语言和思维的尝试，我们也许不难触摸到当前韩国出现的不接受任何身份媒介的匿名诗歌的大致轮廓。

(兰明 译)

